

李歐梵，〈絕望之於希望——五四讀「揸攤」有感〉

《尋回香港文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

1. 五四的傳統精神何在？試從文章中加以歸納。
2. 你同意作者對香港大學生「反智」心態（P.97）的分析嗎？為甚麼？
3. 為甚麼香港的大學生被評為「既天真又世故」（P.99），試就所認識的大學生為例探討是否如此？
4. 你覺得現今香港的大學生跟作者當年在文中所述的有沒有不同？
5. 綜觀整篇文章，大學生應以甚麼準則選科？你的看法如何？

李歐梵：《尋回香港文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

絕望之於希望

五四讀「揸攤」有感

95

四月十九日《明報》教育版刊出下面這個「專訊」：「『明報專訊』教資會秘書長張寶德昨日在中文大學推銷學分轉移制，豈料候任中大學生會副會長周峻任卻質疑不應以學生喜好決定撥款，他更赤裸裸地表白：『學生選科最重要是夠類，揸攤（容易過關）、好不好 Grade（是否容易獲取好成績）。』張寶德聞言大為吃驚：『中大學生這樣選科，沒有學分轉移都無希望。』頓時火花四濺。」

在五四運動的紀念日重讀這段大學生的表白，我啼笑皆非。我認為這位中大學生說的是實話，我從港大學生口中聽到的也不相上下。甚至今春我參加講授的一門電影課要求稍嚴了一點，學生就紛紛退選，棄之如敝屣。大概這門課不符合以上三個條件：「夠類、揸攤、好不好 Grade」！即使用學分轉移制，我猜中大或他校的學生也不會來選。張寶德先生回答得頗義憤填膺：「學生不能滿口理想，一方面不想教育商品化，同時又做比商品化更不如的事情……」

96

李歐梵

「五四」時代的大學生是理想的一代，他（她）們除了愛國之外，還相信知識就是啟蒙的力量，當然更願意選課讀書，甚至不得大學之門而入的「閒雜人等」——如毛澤東——也爭相聽課，在北大課室內外都不怕擠破頭。北大的學生領袖傅斯年，後來當了台灣大學的校長，也把北大的精神帶到台大校園，所以台大學生又在「知識」這個價值上面增加另一個價值：學術獨立、言論自由。顧名思義，言論自由是在尊重學術獨立的大前提下提出的。不料八十年後，香港的學院「自我增值」的結果，鬧出來的卻是所謂鍾庭耀事件。

似乎五四的學術傳統，在今日香港早已蕩然無存。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家會說：五四時代的中國，尚沒有進入商品資本主義的時期，大部份的大學生（鬼混的公子哥兒另當別論）都窮得甚至買不起書，爭着要教授發講義，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就是為了「應景」而完成的。到了四十年代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大，教授和學生更窮，油印講義的紙更壞，

但讀書風氣更好，學生反而更用功，更有理想，恐怕從來也沒有考慮過「揸攤」或「好不好 Grade」！如果當年自願在西南聯大任教的英國名批評家燕卜蘇（Elizabeth Hoggson）教授今日來港大或中大任教，不知道會怎麼樣？「七種曖昧嘅乜嘢？abigility 呢個字我都唔識，你講乜鬼？」

我認為這種學生的「反智」心態，其實和商品無大關係，即使有，也是間接的，因為上學不是好買賣。如果學問是商品，學生是買家和消費者，容易拿好 Grade 的課究竟是便宜貨還是名牌？它的「商品」價值何在？據說，還有人想出一種更便於學生「採購」的方法：學生上完了課如果滿意，就交給任課老師一個 coin，老師再憑 coin 的多少支薪。如此這般，教授豈不像地下舞廳的舞女？

學生的「反智」心態，其實就是對知識不尊重——包括實用的知識——也是對學生自己的智力不尊重，更遑論五四時期的另一個傳統：知識份子是靠着自己的智力和新知識來啟蒙大眾，為國為民服務，當然在

國難當頭的時候，更義不容辭地肩負起救國救民的任務。李澤厚認為五四時期的「救亡」心態太重，壓倒了啟蒙的任務，所以忽略了真正的知識啟蒙的意義。當然更沒有達到知識即真理、為探求真理而讀書的西方傳統。

西方大學的傳統教育，在近世也經過一番衍變。明眼人都看得很清楚：韋伯所謂的合理化（rationalization）成了現代化的必經過程，表現在大學教育，就是制度化、程序化、專業化和效率化。在香港和其他受西方影響甚深的地區，這「四化」幾乎變成了金科玉律，甚至較歐美「先進」國家還有過之而無不及。我認為在香港除了「四化」之外還應該加上一套極有效率的「管理化」。一位土耳其學者，把這一類的現象稱作「過度的現代性」（excessive Modernity），香港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以後或有機會討論。

在這種「四化」或「五化」的影響下，香港社會的商業化或商品化才

得以乘虛而入，使得大學生在茫然不可適從的情況下變得既天真又世故；天真得猶如初中生——所以被動、怕老師、怕考試、怕得壞分數；但未出校門卻又世故（或世儻）得可以連夜排隊買股票、在課堂打手機、不把老師當人看（只不過是一件商品？），更遑論尊師重道？於是為了有「效率」地享受三年大學人生，才講求「夠類」、「揸攤」、和得容易分數。「不重視是否學到東西」；重視的是如何在三年裏混一個文憑，畢業後可以用來搵錢。

如果以上的猜測和解釋與香港大學生的實情不合的話，我非但敢於認錯道歉，而且也為香港的前途慶幸，但願以上我的看法是錯誤的！即使大多數學生要「揸攤」（我特別鍾意這個廣東話名詞，好像和蠱惑仔「揸咗」差不多）、「夠類」，我最近才發現也有少數人願意和我談學問。和這些同學談話，對我是一種享受和樂趣，比看一場香港電影更過癮；和這些學生在課堂內外交往，也從來不談Grade。妙的是：這類學

生的作業分數也往往比「揸攤」的學生更高。

近月來，當我面臨絕望（在香港一年竟然沒有教出一個好學生）的時候，卻碰到一位十七歲的中學生，在我演講後向我提問，我當時的感覺就像魯迅在上海內山書店碰到一個買不起他的書的窮學生一樣，立刻學着魯迅寄一本我的學術著作送他。香港既然有這樣的學生，也令我稍感欣慰，遂使我也想到魯迅常引的另一句名言：「絕望之於希望，正與虛妄相同。」

劉紹銘，〈名網恢恢〉

劉紹銘，《煙雨平生》（香港：天地圖書，2003。）

1. 本文寫於差不多二十年前。今天香港年青人趨慕名牌的風氣與當時有沒有分別？
2. 作者對年青人喜愛名牌，提出了甚麼理由？你同意嗎？試分享你的感受和經驗。
3. 作者對這種風氣，抱甚麼態度？從文中甚麼地方反映出來？你呢？
4. 請圈出文中你感到幽默諷刺的地方。試分析這些幽默語言是怎樣造出來的。
5. 請圈出文中的四字詞語。其中哪些是成語？哪是不是？甚麼叫成語？有甚麼特點？本文寫於差不多二十年前。今天香港年青人趨慕名牌的風氣與當時有沒有分別？

名網恢恢

名網恢恢的「名」，是指名牌的名。最近曾有「揚才露己」之作。此篇可視為餘緒。

最近在電視新聞看到，十來歲的中學女生，三五成羣地跑到「名店」買名牌書包，價值十五元左右。

記者訪問了一位媽媽，問她的感覺如何。她搖頭歎氣說沒辦法，因為女兒的同學出入名牌，自己覺得如果不能「有樣學樣」，就顯得寒酸，最後可能因此失去朋友。

「有樣學樣」相當於英文的 *peer pressure*，令美國為人父母師長輩傷透腦筋的「同輩壓力」。你的「死黨」吸毒酗酒，你不亦步亦趨，就是非我族類，最後十之八九分這場鏖。

過去二十年我住的美國小鎮，以手錶來說，精工已屬名牌。干邑拔蘭地，未聞有XO。這個地方要買價值二百美元的「書包」，店員只能代你向東西兩岸名店採購。

報上經常看到，警察「掃黃」時，不少歸案的未成年少女，出賣皮肉，非為療飢，而

是為了尋求豐衣足食以外的享受。湊夠錢買名牌，想是動機之一。

名牌的誘惑，自然不限於年齡、性別、膚色。識貨的伯樂，無不意亂情迷。不過，說這名牌之魅力，已屬老生常談。請改一角度斟酌。

名牌代表精品，是人類社會物質文明，由獸皮裹身到名師量身獨家設計的進步標幟。因此，誰瞧不起名牌的身價，誰就是徹頭徹尾的反動分子。金雕玉琢的手錶水筆，出自名牌，更有非凡的藝術價值。產自米開朗琪羅家鄉的皮鞋，輕巧玲瓏，雙足一登，便會騰雲駕霧。

因此，家財天文數字的社會名流，從頭到腳，理應全部名牌配備。既屬膏粱錦繡之家，交遊非富則貴，大夥兒要見樣學樣，也不會捉襟見肘。大人先生女士穿了四五千元的貨色上路，巧遇無情雨，變了落湯雞，回家大可棄如敝屣，另結新歡。

可是某甲以半個月的收入買了等值名鞋，若遇天雨，我是某甲，必會奮不顧身，脫下鞋子，彎下腰來，以受諸父母的髮膚小心呵護，揣在懷中，確保名門全貌。

同樣一雙鞋子，由不同階級人士穿上，身份截然不同。鞋子是名流的僕役，卻是某甲的東家。某甲為人奴僕，怎敢怠慢東家？可是世事真難以常理測度。香港情形，我還是陌生，但就美國社會而論，有資格穿着名牌的人，卻偏走寒酸路子。ABC晚間新聞節目舵主彼得·堅寧(Peter Jennings)，年薪百多二百萬，穿的西裝，都是在百貨公司隨手撿來的。

貴為白宮主人的克林頓，戴的腕錶，看似廉價貨色。如果他愛國，當是Heck。媚外

呢？Casio。

這怎生解說？一個可能是美國社會尚未執行臨街檢查身份證這套玩藝。堅寧一表人才，即使穿了汗衫內褲在中央公園晨跑，警察先生諒也不會誤認他是風騷。

上面一節，是插科打諢。

私意認為，美國名流少有（不是沒有）「名牌露己」的作為，可能是他們表示身份地位的方式，各有一套。中產階級一有「閒錢」，首先要換的，是「名牌」房子，然後是車子。反觀我們的中產階級，以同等或更過之的收入，怎買得起院前院後雜花生樹、寬敞得少爺小姐也可各據一方的房子？

香港、台灣的「蝸牛族」，想到今生今世也做不了地主，悲從中來，發了狠，把能擠得出來的點滴「閒錢」，豁出去名牌一下。

名牌能在港台社會吃得開，因為此物可以療傷，發揮補償失落的心理治療作用。

名牌不是社會名流的特用品。再說，身為名流，即使在香港，穿牛仔褲赴宴，大不了只把你看作《世說新語》溜出來的角色，怎敢白眼看你？

名牌之為禍，只殃及上述那位以身「殉」鞋的某甲，或迫着有樣學樣的中學生。

近承一同學告知「法母三遷」的故事。其實不是故事，應說近事。法母，是法國文化協會請來教法文的一位法國太太。住的地方，大概是接近「名牌坊」之類的社區。法母有在學千金。來港不久，竟受盡名牌污染，朝夕纏着「法母」，要死要活的嚷道：「我要

名牌書包呀！快給我買名牌書包呀！不然不但你沒面子，我沒面子，法蘭西也沒面子！」

上乃耳食之言，故不知法母三遷到哪個角落。最合情理的推想是，她個人留在香港履行合約，卻把發名牌瘋的乖女遣返法國，留交修道院長老看管。此乃上策，因人在香港，要不受名牌引誘，三遷也是徒然。這怎分教？君不見——

伯爵與愛彼齊飛

Bally 共 Vuitton 一色

端的是，名網恢恢，疏而不漏。

一九九五年

陳冠中，〈兩岸三地一中文〉

陳冠中，《我這一代香港人》（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5）。

1. 近年不少內地詞語在本地廣泛使用（如：到位、出台、加大力度、小三、富二代、鐵桿粉絲等），你對這個現象有甚麼看法？
2. 方言（如：粵語）與標準白話文的關係是怎樣的？港式中文有沒有發展的可能？試從作者的論述加以分析。
3. 作者引述胡適和張愛玲等人的說話，目的何在？
4. 總括而言，作者在語文上提出「多款一中」的建議，是否可行？
5. 近年來社會上出現不少本土意識，包括反對在香港使用內地的「殘體字」，對此問題我們應該怎樣看待？

陳冠中：《我這一代香港人》，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5。

跟兩岸三地的朋友交談，常常感到三地慣用的詞有些是不一樣的，挺有意思。

譬如：香港的民間粵語，常用一個「搞」字，有冇搞錯、搞掂、搞搞震，而大陸官方用語有一陣子也用「搞」，搞革命、搞生產、搞男女關係。倒是台灣人好像是本來不怎麼搞的，可能正是如此，台灣音樂家羅大佑在九十年代移居香港後，大概整天聽到香港人搞這個搞那個，遂想出「搞搞新意思」這樣的歌詞，這用法並不是香港固有的用法，但香港人也樂於接受，可見我們多喜歡搞，或搞搞。

能廣為流傳的方言用詞大概反映了地方的特色，特別是地方的強項，譬如早就流行全國的廣東話是「生猛」，反映廣東人的愛吃，特別是吃海鮮。現在大陸有些年輕人學周星馳說「我先走」，也反映香港電影一度的強勢。

政治中心的強勢當然也起作用。譬如，前國家主席江澤民說「與時俱進」，前香港特區首長董建華就在施政報告說「與時並進」，現國家主席胡錦濤說「以人為

* 本文係香港「探索跨越疆界寫作的秘密」論壇發言稿

本」，董建華就在施政報告說「以民為本」，有創意吧！

北京人很喜歡說：是嗎？譬如我說：你叫我辦的事，我辦好了！北京人會回應一句，是嗎？他並不是在懷疑我。但是大陸許多地區不習慣說「是嗎」？他們喜歡說「真的」？台灣人就特愛說「真的」，我們可以想像如果北京人對着台灣人說「是嗎」？說不定有些台灣人會以為北京人在懷疑他。有時候語言引起誤會還真容易，是嗎？真的。

英國反諷名作家王爾德 (Oscar Wilde) 有兩句名言，第一句是「英國和美國是被一種共同的語言所分裂的兩個國家」。第二句更清楚：「我們英國人現在其實一切跟美國人都是共通的，當然，除了語言」。

當然，這是搞笑之言，英美的英文再不一樣，也沒有互相看不懂。兩岸三地中文情況也接近：不完全一樣，但也不會完全看不懂。

八十年代我在香港搞電影，香港電影都有中文字幕的，那時候台灣市場很重要，除了國語版請香港說國語的北方人配音外，字幕也是請那些操國語的中文比較好的香港北方人，把粵語對白改寫成國語字幕。我們以為做得很周全了，但後來我才知道，台灣說國語的外省觀眾都一直覺得我們香港電影裏的字幕有點怪怪的，原來香港說國語的人的標準中文跟台灣說國語的人的標準中文已經是不一樣的。

84 我常發現用中文寫作的香港人，心裏面往往有個

陰影，怕自己的中文不夠標準、不夠正宗，過去更曾經有學者拿這來說事，鼓吹所謂純正中文。香港不少文化精英很努力的想把自己的中文純正化，因此也最焦慮。大陸台灣固然也會試着規範中文，但只是為了用字符號的標準化，而不是懷疑自己的慣用中文是不正宗的。相反，它們都認為自己才是正宗的，結果，看看兩岸應該是最規範的書面語，那些公文，官方文句，還真的不太一樣。

香港的作家是挺可憐的，你看看許多香港的小說，裏面的人物明明是當代香港人，但他們的對白，基本上是白話文國語普通話，而不是現實生活裏他們身份應說的生猛廣東話。

這方面北京作家心裏最踏實。那些寫現在的北京的小說家，把北京的流行話語都寫在小說裏，從來沒想過其他地方的人看不看得懂。老舍這樣做，叫京味、到了王朔叫新京味。有一次我說，你們北京作家多幸運，說得出就敢寫，別人看不懂就得學。他們說，還真沒想過存在着這樣的問題。

可憐地方上的中文作家，要在上下文自明的情況下，在想像的標準中文書面語之下，加點特色方言俗語，作為風味點綴。對地方作家來說，寫作中的方言俗語只能適量，多了其他地區讀者就看不懂，有點像改良過的地方風味菜，太原汁原味倒怕別地方人不愛吃。

不過，在上世紀白話文建構之初，卻對方言文學另有期許。當時有人說：「今日的國語文學在多少年前都不過是方言的文學，正因為當時的人肯用方言作文學，敢用方言作文學，所以一千多年之中積下了不少的活文學，其中那最有普遍性的部份逐漸被公認為國語文學的基礎。我們自然不應該僅僅抱着這一點歷史遺傳下來的基礎就自滿足了。國語的文學從方言的文學裏出來，仍需要向方言的文學去尋他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吳歌甲集序》）

說這話的不是別人，而是白話文的創導者胡適。甚至到了1930年，胡適還在替吳語小說《海上花列傳》寫序，他說：「中國各地的方言之中，有三種方言已產生了不少的文學。第一是北京話，第二是蘇州話吳語，第三是廣州話粵語。」

他又說：「方言的文學所以可貴，正因為方言最能表現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話固然遠勝於古文，但終不如方言的能表現說話的人的神情口氣。古文裏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話裏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話裏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活人。」

我們民族的白話文國語倡導者竟如此肯定地域特殊主義，實在不可思議，原來白話文要替代的是文言文，而不是對方言，並且方言是被認為可以豐富白話文和國語寫作的。

胡適對方言文學的肯定是很清楚的，但是他對方

言文學寄望過高，方言文學在中文文學的歷史發展中並沒有如胡適所料的扮演重大的角色，國語白話文學是遠蓋過方言文學的，方言連對白話文寫作的影響，也不如文言文，恐怕還不如日本翻譯新詞和歐化翻譯語體。但有一點可看到，在胡適1930年的觀念中，白話文和國語並沒有一種不變的標準，沒有預設一種其他人只准模仿、學得最像者得最高分的所謂正宗中文。胡適所持的是一種動態發展觀，期待着中文的演變。

半個世紀後，張愛玲覺得有責任將胡適認為「是蘇州土話的文學的第一部傑作」的《海上花》，改寫為國語。她在「譯者識」裏說：「全部吳語對白，海上花是最初也是最後的一個，沒人敢再蹈覆轍……」。

全部吳語對白，沒人敢再蹈覆轍，可見那怕是最傑出的方言小說，要讓更多人接受，還是要翻譯成國語。

不過張愛玲還帶着跟胡適一樣的一廂情願，她竟說：「……粵語閩南語文學還是生氣蓬勃，閩南語的尤其前途廣闊，因為外省人養成欣賞力的更多。」

張愛玲是中文寫作的大家，卻對方言文學有着錯愛，只是她也完全高估了地域方言閱讀的習慣，事實上，雖然台灣有人提倡土語寫作，但粵閩方言文學怎麼看都說不上生氣蓬勃。

全部用方言寫作，譬如用香港粵語寫作，別地

區人不說，連香港人也看不懂，除非他一個字一個字的念，但這違反了閱讀習慣和效率，甚至謀殺了閱讀樂趣。

純方言的寫作會趕跑絕大多數的人，包括說那種方言的人。

當然，個別寫作人可以任何方式寫作，包括方言寫作，那是他的自由，只要他忍得住寂寞。

可以說，除了北京方言外，其他中文方言文學從來沒有起來過。可以說，有的只是帶着地方色彩的書面語寫作，沒有大規模的方言文學風潮。

白話文書寫，作為當代中文書面語寫作的原生態，本來就是沒有單一標準的，並且一直是有限度的有着方言俗語入文，特別是北京方言俗語入文，然而更多是文言文入文，外來新詞入文，洋化句子入文，更不說網絡中文，嘻哈音樂中文等情況。

但是兩岸三地的中文仍有着很大的共通性，雖沒有想像中的統一純正，可是也沒有走到另一極端，即全面方言化、部落化或洋涇浜化至互不理解——分裂主義是不成氣候的。

中文內部存在着差異和混雜，只表示了中文是活的、文化是活的。中文的轉變，也表示着操這語文的人的轉變。我們不能往後退，退到自己的鄉村的竹籬笆內，或退回大一統的鐵籠裏——純粹主義也是站不住腳的。

我們應該包容、尊重，甚至享受，互相混雜卻有差異的中文書寫、搞搞新意思的中文。

巴基斯坦裔英國作家哈尼夫·庫雷西 (Hanif Kureishi) 有一篇小說的名字叫：你的舌頭在我的喉嚨。

沒錯，如果我願意，我歡迎甚至享受你的舌頭在我的喉嚨，但如果我不同意或心情不好，請不要硬將你的舌頭塞進我的喉嚨。

總結：中文從來都是在轉變中，不用過份擔心中文會分裂。

現在政治上，有所謂兩岸一中。

套到文字上，兩岸三地的中文是：一種中文，多種款式，可稱為「多款一中」，這情況下，方言寫作不可能急獨，標準中文也不必強求急統，最好是不統不獨，求同存異、只要承認一中，順其自然的等時間來搞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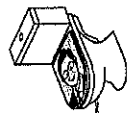
多款一中的意思是：從來就是混雜和多樣的當代中文，在一種想像中的所謂書面語共同標準下，並在白話文和普通話約定俗成的歷史發展軌跡、讀者的認受局限等多種制衡下，各地方、階層、族羣、性別、世代、載體、以至個別寫作者，仍然可以有有限的作出「一種中文，各自表述」。

(2005年)

施永青《無為管治》(節錄)

《在廁板上悟出來的道》(香港：AM730 Publishing Limited，2006年)，頁 130-137。

1. 為甚麼作者在企業內要改用無為管治？
2. 為何作者在企業內推行無為管治後，可以在商業上取得巨大的成功？
3. 作者在文中提出「成功皆因死好命」，又提到「老細無為伙計才有得作為」，你同意作者上述這些觀點嗎？
4. 作者從《老子》(《道德經》)無為哲學中悟出企業管治之道，你可否舉出更多現代商業社會中善用中國哲學，而取得企業營運成功的例子？



中原為何會走向無為而治？

人們常以一種懷疑的眼光望著我，當我告訴他們我是以「無為而治」的方式來管治中原名下的公司時。

在他們看來，地產代理管少一點也不行，連政府也要專門成立「地產代理監管局」來監管這個行業，分明是非要「有為」不可，若是不花氣力去管，一定會錯亂百出。

要管地產代理的確不容易。聘請太老實的員工，可能做不成生意；要是請一些過份「醒目」的，則可能連公司也欺騙。

地產代理不是純坐在辦公室內工作的，不能靠安裝閉路電視整天監察他們。他們需要去見客人，帶客人去視察物業，他們在外面究竟做了些甚麼？根本無從監察。

中原開始的時候，也曾試過以嚴密的管理系統去管治地產代理。凡出外工作，要先問准上司；工作回來，得向上司匯報工作的進度。後來生意好了，上司可能有時也不在公司，根本沒有機會問准上司才出外工作。於是又發明各式各樣的表格，要求員工填報這樣，填報那樣。

地產代理是靠佣金作主要收入的，填表是不會增加佣金收入的，因此他們對填表都非常厭惡，總是陽奉陰違，馬虎了事。要執正來做的話，管理人員就忙個不可開交，也看不到明顯的成效；不執正來做的話，制度就如同虛設。

其實不只地產代理不喜歡做這類沒有建設性的文書工作，連做教師的也抗拒這類工作。近年教統局加強了監管，無論是教師

還是校長，都怨聲載道，弄到教統局的官員都差點要為此落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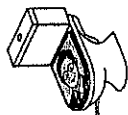
我當時的合作夥伴是一個意志堅定，永不言敗的人，由他訂出來的監管制度，他是不管花多少氣力，也要貫徹到底的。結果就苦了中層的管理人員，常被夾在中間，兩面不討好。其中不少更因執行紀律不力而失去我夥伴的歡心，紛紛被迫離開公司，令公司流失了不少人才。在這樣的環境下，公司當然不容易壯大，變成每隔一段時間就出現一次大規模的管理人員流失，造成大量的內部虛耗。最後，連我的合作夥伴亦因眾叛親離而被迫放棄管理工作。

我吸取了他的教訓，知道要細緻監管人的具體行為是不容易的。即使是紀律部隊，也只能在進行步驟時才能步調一致。地產代理的工作性質複雜，不可能用左右左的步驟方式去管理。

因此，在我當政後，我轉行另一種相反的管理哲學，不再企圖具體操控員工的細緻行為，而是篩選一個識他們肯自發努力工作的環境，利用工作成果去吸引他們，利用社會的需要去制約他們。我借老子的道德經，稱這種管理為「無為而治」。

由於篇幅有限，無為而治的具體細節容後再談。

2006-04-13 C觀點



我在廁所裡悟道

老實說，我年輕時對老子的學說是一點好感也沒有。我當時尚未正式讀過《道德經》，只聽過國文老師說，老子的理想世界是：「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我想，這樣的思想在農業社會或許還可以，在全球一體化的今天，一定不合時宜。

因此，我雖然有逛書局的習慣，而且書看得很雜，但一直沒有買過有關老子的書，直到有次郊遊，無意中去到青松觀，在通道旁放著任人取閱的《道德經》，我見不用錢，就隨手拿了一本。

在旅途上，我曾嘗試翻閱一下，但不容易看得明白，回家後就放在書架上，不再理會了。如非我有上廁所看書的習慣，這本《道德經》可能從此不見天日。

有一次，急於上廁，沒有時間揀書，就隨手在書架上抽了本書，到坐下來才發現是老子的《道德經》，心裡真有點失望，但為時已晚，無法替換，只好姑且一讀。

很奇怪，不知是閱歷多了，還是當天的精神狀態特別好，我坐在廁板上竟忽然開竅，有所領悟。因此，在某種程度來說，我可謂是在廁所內悟道的。當時，公司的管理層正為員工的衣著問題而爭論不休，弄到我非常煩惱。

早年，香港很多公司都規定女性上班必須穿裙子，中原作為一間以營業為主導的公司，當然也有這樣的規矩。但有部分女同事認為：時代不同了，不一定要穿裙子才算大方得體，穿褲子也

應可以接受，這是大勢所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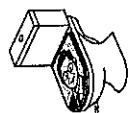
公司的管理層對此意見並不一致，弄出了一個妥協方案，先容許女同事穿裙褲。然而，大家對裙褲的定義並不一致，於是要求嚴的主管就指責要求鬆的主管做壞規矩，任由下屬穿著似褲多過似裙的服裝，令他做了醜人。

結果要勞煩董事會為裙褲下一個明確的定義，以避免管理層繼續爭拗下去，試想像一下，一間地產代理公司的董事會，開會時不研究如何推銷樓盤，而改去研究甚麼才算裙褲，真是荒謬！

就在我為此感到煩惱的時候，我看到《道德經》上有一句這樣的話：「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我心想，員工穿著甚麼衣服，本身受到社會的制約，公司大可以不管這麼多，那管理層就不用那麼煩惱了。事實上，營業員為了給客戶留下一個良好印象，一定會設法打扮得大方得體，因此，當公司不再在這個問題上諸多限制時，營業員並未在衣著問題上出過甚麼大亂子，反而有人主動去研究如何改善社交禮儀，以給客戶留下一個好印象。

由此可見，過份有為，樣樣都管，結果只會愈管愈煩；相反，讓事情自然發展，它一樣受到「道」的制約，效果可能比人為的好。

2006-04-18 C觀點



成功皆因死好命

一般而言，成功的人多相信「有為」，以為自己的成功乃由自己的努力得來，只要自己繼續努力，就會繼續成功。久而久之，還會沾沾自喜，以為自己已掌握了一套成功之道，立功之後還想立言，把自己的成功之道四處吹噓，甚至結集成書，希望可以流傳後世。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我也算是白手興家，成就了一番事業，所以常有不同的團體邀請我去介紹成功之道。然而，我愈是思考成功之道，愈感到恐懼。我不相信，別人沿着我以前走過的路就可以成功，就是讓自己由頭再來一次，也不保證一定會成功。世人常把先後關係誤作因果關係，把先發生的事誤以為是後發生的事的原因，以為做了一次先發生的事，就會再出現後發生的事。但在現實世界裏，這並非必然。

某人在澳門贏了錢，發覺當日原來自己穿了一對不同顏色的襪子，他就以為只要下次再穿那雙襪子去澳門，他就可以再度贏錢。讀者可不要以為他的想法可笑，其實人類所總結出來的成功之道，大部分與此差不多。

現實世界的成功，都是在某一個時空下產生的，時空變了，以前成功的做法，在新的時空下就不成功了。人類無法把時空再做，等於人類無法必然成功。

科學實驗之所以能夠成功，是因為我們可以操控實驗室的環境。但人類生活的環境遠較實驗室裏複雜，一切都在不斷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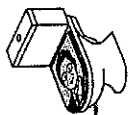
並且會互為影響，有很多不可預測的偶然因素。而這些偶然因素的出現，對成功與否一樣可以產生重大影響。此之所以，成功的人也一樣會相信命理、風水之類的東西。

我並非鼓吹迷信，我自己對這類東西是完全不相信的。我只是認為，人不應貪天之功以為己力，過份迷信以前的成功之道，那就會令到一個人自以為是，胡作妄為，不尊重天道，以致自投末路。

我之所以會日漸趨向「無為」，就是因為年輕時過份傾向有為，以為只要自己肯努力，事情總會有成功的一天。到年紀長大了，遇到的挫折多了，才知道世事有它自己演變的規律，人能產生的影響其實不多。

我認識一些朋友，人比我聰明，付出的努力也不比我少，但總是時運不濟，至今仍鬱鬱不得志。這才令我相信，成功的背後除了有一番努力外，還需要有「死好命」。一個相信自己已掌握成功之道的人就會偏向驕傲，相反，一個相信自己是死好命的人會比較謙虛。人肯謙虛，才知道自己有所不知，才有接受新知識的能力，才能在人生的路上不斷前進。過度迷信過去的成功之道，只會令自己停滯不前，最後只能靠想當年渡日子。

2006-04-19 C觀點



老細無為伙計才有得作為

一般而言，做得老細，當然想有所作為。因此，很多老細心中早有一套鴻圖大計，深信只要伙計全力推行，成功一定指日可待。然而，有很多老細就是因為太過有為，甚麼都一早設想好，根本沒有空間留給伙計去發揮創意。結果公司裏只有老細一個在動腦筋，請了幾本事的伙計都沒有機會發揮他們的作用。

老子說：「善用人者，為之下。」意思就是：要善於用人，就願意自處於一個低下的位置。劉備若是不肯三顧草廬，諸葛亮就未必會為劉備所用。但大部分老細都自以為是，只要伙計聽他指揮，很難聽得進不同意見。

我年輕時也常以為勝人一籌，伙計沒說出一半，我就可以判斷他下一半想說甚麼，第一時間就叫他收聲，依照我的指令去做算了。結果伙計工作都不起勁，他們似乎樂於看到我的指令出錯，多過想工作做出成效。

接觸老子的學說後，我改變了我的作風，就是盡量不給指令。伙計遇到問題與我商量，我會樂於提供我的意見，但不一定要他跟我的意見去做。他可以選擇跟我的去做，亦可以選擇行自己的一套，由於是他自己的選擇，他必須為自己的選擇負責；即使他是跟我的意見去做，出了問題，責任也在他身上，而不是在我身上。

人通常對自己想做的事會特別落力，為了令我的下屬肯落力工作，我除了公司的大方向外，盡量不提具體的工作方案，只要

我能克制住自己不先開聲，下屬總會忍不住，各自向我獻計。

在大部分的情況下，下屬提交的方案我都會讓他一試。有些我認為為行不通的，我也不去阻止。不讓他們撞下板，他們是不會心息的。有時很奇怪，我以前試過行不通的，給他們去試卻成功了。可見我的觀察有時也不一定正確。老子說：「知不知，尚矣。」就是要提醒我們要謙虛一些，要知道自己有所不知。

很多方案，由於是員工自己提出來的，他就視這個方案如他的寶貝，千方百計要令到他的方案得以落實，不肯讓它中途夭折。

我曾試過星期天回公司工作，撞到一個女同事，她很不好意思的走過來說：「施生，真不好意思，我沒有問准你。」我問她甚麼事沒有問准我，原來她有些工作未能做好，所以星期日用了她的男朋友返公司幫手做，她擔心我會不高興。我說：「不要緊，下星期日可以再來。」我心想，這有甚麼不好，我請一個人，現在有兩個人為我做事情；聽說，她的男友還是一個博士呢！

由此可見，無為不一定會一事無成，上面的人無為，下面的人才可以有所作為。老子說：「為無為，而無不為。」就是說有些事不有為地去做，反而可以做出來，而愈是無為，成就出來的事可能更多。由於我肯無為，我相信經我手弄壞的事一定沒有其他老細多，這或許是中原得以壮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2006-04-20 C觀點

林沛理，〈書展——量等於質？〉

《破謬。思維》（香港：天窗出版，2009）。

1. 你去過每年一次的香港書展嗎？與作者所述體驗是否相同？試分享你的經歷。
2. 作者認為香港書展淪為地攤文化，你是否認同他的批評？為甚麼？
3. 作者如何以「虛假需求」的概念去解釋書展的運作？你同意嗎？試從作者的論述加以分析。
4. 何謂「理想的閱讀狀態」？它可否跟書展並存？
5. 香港書展的本質和意義何在？試闡述你的看法。

書展——量等於質？

香港書展彷彿已經成為「香港有文化」和「香港人喜歡讀書」的鐵證。媒體每年報道的焦點，以至主辦機構宣傳的角度，總離不開數字——銷售額與入場人次的增幅。輪候進入書展會場的人龍將會展中心一帶擠得水洩不通，成為書展最具代表性和最有說服力的影像。主辦機構香港貿易發展局更被譽為締造了「香港文化的傳奇」。

問題是我們不可以用衡量買藏波、港產片和漫畫節的標準來評價香港書展。如果堅持要這樣做的话，那反映了我們文化心態的粗鄙和文化意識的落後——只有量的觀念，沒有質的判斷。所以，要談香港書展，便要抹掉那些新聞稿的辭藻，忘記那些出現在電視和報章的人頭湧湧的景觀；而要深入讀人的數字和浮面的影像底下，看看書展的成功究竟是貨真價實，還是金光假象。

根據我多年來對書展的「實地考察」，得出的結論是它絕非一個「愛書人為愛書人辦的書展」(a book fair by and for book lovers)。一個愛書人——他可以是讀者、作者、出版商、零售商或者發行商——對書總有一份憐惜。他知道，一本書得以面世，從寫作、植字、排版、配圖、校對、印刷到發行，最終落在讀者的手裡，所有的功夫和麻煩都是一種愛的辛勞(labor of love)。雖然最後可能空愛一場，愛的辛勞變成愛的徒勞(love's labor lost)，但因為心中有愛、心裡明白，所以當愛書人將一本書拿上手翻閱，眼神總是溫柔的，心裡總有一絲激動。這就是為什麼互聯網、電腦下載和桌面出版(desk-top publishing)永遠都取代不了傳統的書籍出版和印刷。

近年宵心態與地攤文化

可是在香港書展，書籍卻變成了價廉物美的減價貨(bargains)，而參觀書展的市民則是眼明手快的「平貨(便宜貨)獵人」(bargain hunters)；整個書展成為一個讓市民在雜貨堆中尋寶的跳蚤市場(bargain hunters' flea market)。書展在金碧輝煌的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但裡面賣的仍然是侷促、廉價、難登大雅之堂的地攤文化。

所謂地攤文化，就是一種永遠處於臨時與野台狀態，隨時可以收攤、拆台，換個地方再擺的銷售形式(在展覽現場，隨處可見丟在地上的書籍雜誌)。它既是一種光怪陸離、無貨不可賣(最無聊的漫畫、最幼稚的愛情小說與最嚴肅的學術著作在同一個攤位發售)的江湖郎中文化，亦是一種「充滿聲音與憤怒，卻毫無意義」的煽情叫賣文化。

香港書展的這種地攤文化，可以說是香港地產文化的原始版。兩者皆是香港人急功近利性格的極度呈現——地產商大都沒有興趣做長遠的投資、策劃與經營，大部分參展書商花最大力氣做的，就是賺眼前這一筆。於是，擺地攤的人固然施展渾身解數爭取顧客與現金，逛地攤的人也抱著湊熱鬧、逛年宵的心態「搜捕」便宜貨。在擺攤與逛攤的過程中產生的喧囂、擁擠和眼花繚亂，正是這種地攤美學的必然副產品，也成為了每年書展的本質體驗(quintessential experience)。

在這個意義上，書展為入場人士提供了一種典型的、精髓的香港經驗，那就是與成千上萬、為同一目的而來的陌生人摩肩接踵的擁擠經驗。

擁擠是香港生活與香港經驗的主要元素：從上班下班的繁忙時間擠巴士和地下鐵，到在假日窩頭攪動的旺角、銅鑼灣和尖沙嘴擠酒樓、商場和戲院。買樓、看病、註冊結婚、娛樂消費、為孩子找學校，通通要在兵荒馬亂、人頭湧湧的情況下進行。生活在香港，似乎去到哪裡都是人，固然是因為香港地小人多，而人口的分布又極不平均；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香港作為一個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特點和單向性。

創造潮流與虛假需要

將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個體 (individuals) 變成隨波逐流、人云亦云的消費群 (consuming masses)，是資本主義的鬼斧神工。香港人喜歡隨大流、跟大隊，一窩蜂地做同一件事，跟資本主義內在的支配性本質有莫大關係。資本主義制度作為一種能使自身永久存在 (self-perpetuating) 的制度，擁有的就是創造潮流與虛假需要，以及「召喚」群眾的能力。

翻開《單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 一書可發現，馬爾庫塞用「虛假需求」(false needs) 這個概念，解釋企業界和資本家怎樣利用產品的供應和宣傳以及廣告和潮流，來支配大眾的消費、行為，甚至喜惡和愛恨。所謂虛假需求，就是那些被大企業和資本家有組織、有策略地釋放給民眾的需求。這些需求的滿足給予我們一種虛假的安全感和滿足感，並慢慢扼殺了我們對社會現實的關注。

馬爾庫塞筆下的「單向度的人」，就是那些完全受廣告與潮流支配，以滿足虛假需求為生活目標的人。

馬爾庫塞認為，虛假需求是資本主義的「生命力」(life force)：它帶動生產和消費，創造就業，促進經濟發展。簡言之，虛假需求以及它的滿足，是驅動資本主義社會持續運作的基本能量。

狡猾的商人通過無孔不入的廣告、宣傳和包裝，以及傳媒的推波助瀾，將虛假需要當成「非擁有不可之物」(must-haves) 推出市場。缺乏警覺性的大眾不但沒有覺得自己被剝削和被操縱，反而以為有關的產品和服務完全符合他們的需要和利益。法國哲學家阿爾杜塞 (Louis Althusser) 把這種大眾對主流意識形態的內化和不假思索的服從，稱為「召喚」(interpellation)。

召喚

Interpellation

活在今日的香港，不時會收到資本主義社會的「急call」，要我們千方百計去滿足各式各樣的虛假需要。社會學家稱這種對消費者的難以抗拒的誘惑為「召喚」。

以香港書展為例，每年越來越多的香港人就像執行嚴格指令一樣排隊入場，但他們有否想過書展究竟滿足了他們甚麼需要，而這個他們「得到」的書展又是否他們「應得」的 (Did they get the book fair they deserve)?

不尊重書本 不算成功的書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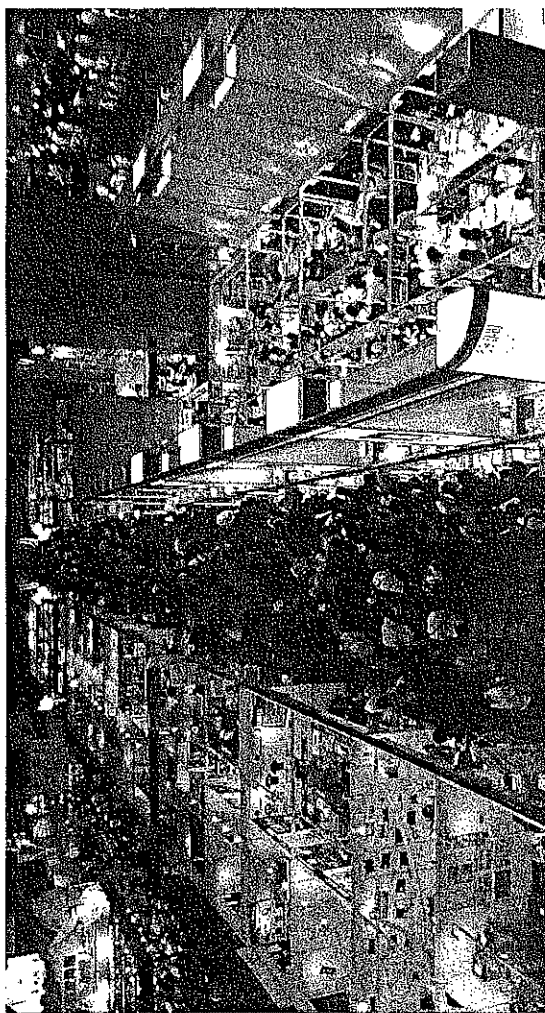
書展提供的經驗，是否應該在本質上與電影、逛年宵市場或工展會有所不同？是不是香港人體驗盛事的能力，已經狹窄和貧乏得無法跳出擁擠

「進入理想閱讀狀態」的書展又何來主辦商和參展商？

其實我也不是不食人間煙火至此，對書展我只有一個卑微的請求：在寬廣的場館留一寸之地，好讓我們這些愛書、借書和讀書的人可以好整以暇地將書拿上手翻閱甚至細讀。這是不切實際的要求嗎？

一個完全不能體現對書本的尊重、提供一個起碼的閱讀環境的書展，即使能夠吸引100萬人次入場，也稱不上成功。當然，我們不能把責任完全推在主辦機構或參展商身上。閱讀在香港這個反智社會，本來就是一项不時招來訕笑和奇異目光的出軌行為（deviant act）。從這個角度看，以「隨時可以收攤、拆台，換個地方再擺」的地攤方式展書、賣書，就像賣盜版碟一樣，不但無可厚非，甚至是順理成章的；雖然在曾經舉行過香港主權交接儀式的會展中心擺地攤，總令人覺得格格不入。

也許以上只是一個book lover 的偏頗之見。只是當書展把香港人對讀書、賣書和買書的態度赤裸裸地展覽在你的眼前，你可以視若無睹嗎？看到後你可以閉口不談嗎？假如書展真的有什麼重大意義，那絕對不是它的入場人數破了紀錄，而是它令我們再沒有藉口不反省書在香港人心目中的地位，以及閱讀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在香港的前景。



的範圍之外——就像部分的本地傳媒，彷彿不知閱讀為何物，不拍攝場館的水洩不通，不報道書商的貨如輪轉，就沒有關於書展的故事可講。

耶魯大學教授布魯姆（Harold Bloom）說過，閱讀最大的功用是幫助我們善用孤獨（the wise use of solitude）。閱讀不是要「殺死」時間，而是要學習怎樣跟時間做朋友。從這個角度看，我們抱著趁墟和看熱鬧的心理去書展，與所謂「理想的閱讀狀態」正好相反。當然，書展是一盤大生意，牽涉其中的不僅是入場人士的需要和興趣，還有參展書商的利益甚至生計。一個讓人

潘步釗，〈語潮〉

《美哉少年》（香港：匯智，2010），頁 51-57。

1. 依據作者篇中所說，甚麼是「語潮」和「潮語」？兩者究竟又有甚麼關係？
2. 作者對社會上流行潮語的現象有甚麼看法？
3. 作者在篇中所舉出潮語對語文及社會的影響，你是否同意？
4. 作者在篇末所提出了怎樣的擔憂？你認同作者這一想法嗎？

讀者們沒有看錯，這篇文章的題目真的是「語潮」，不是「潮語」，雖然說潮語，似乎是投入社會潮流，擺脫老套、證明沒有落伍的簡單方法。事實上，這題目讓我想起新文學運動兩本重要的刊物《語絲》和《新潮》。《語絲》是魯迅和周作人等人在北京創辦的文藝刊物。《新潮》出現更早，在1919年元月創刊，主要人物是傅斯年和羅家倫，主要使命是提倡覺醒意識，推動學術研究。兩份刊物，一份提倡藝術文學，一份意在精神啟蒙，在二十世紀初的熱血青年和知識分子，出版和議論的良好與熱情，在遙遙百載之後，依然叫我尊敬和懷念。

回說這篇文章的題目，既然是討論語言問題，不妨先釋義。語潮之意，語者說也；潮，則當然是潮語。倒裝法在這裏，不是修辭格，是直接敘述，作為作者，我理所當然擁有這種絕對權力。語言淪於暴力、專制，傳媒發達，加上網路縱橫，道理有時愈說愈不清楚。所

以「你在潮，我在流，流到剎那的漂亮」，這樣的時代曲詞，在偶像歌手中，一樣可以叫年青歌迷癡醉、尖叫。討論潮語、火星文，可能要從這些方向切入，才可以說得明白。

現代社會崇尚民主，許多超物質的生活層次卻變得愈來愈專制。例如數碼專制，在數碼化技術的蓬勃和橫蠻現實裏，我們失去了想像的自由、失去了簡單的自由。三維、四維的科技突飛猛進，聲像傳播，把一草一木都毫無保留和想像地呈現，形成文化霸權的重新解讀，科技愈發達，人類視野愈狹窄，感覺愈單純遲鈍。例如走過花叢，未必就只能有香氣的感覺，四維技術的專橫固然可惡，人類在其中的沾沾自喜，才更叫人擔憂。當中的個性化，在藝術世界和現實往來過程，變得漸漸模糊，漫天潮語的可憂可慮，或許也在這種沾沾自喜之中。

對於潮語橫行，社會中人煞有介事，有人出版專著介紹解釋、探源溯流，有人堅稱是文化斷裂的鐵證，漠視就會引來社會激烈動盪。有一年，考試局用潮語作為試題內容，希望引起社會人士的注意，也讓學生明白運用潮語溝通的不足和限制，結果換來社會人士的群攻。

青年人在網上呼籲要聚集遊行，我在一次教育界宴會中，向在座中學校長解說出題者背後的善良意圖，結果自討沒趣，飽嘗了冷言惡相。

潮語的力量就是這樣，潮語的霸道和乖變也在這裏，就是別人一定要跟從，你不這樣說，就是「老餅」，就是應該被臭罵，當中的衝動主觀，支持和反對者都一樣，像那幾位連試題也沒有看過的校長。當然，在神秘的權威面紗卸下的今天，考試局如果沒有被臭罵的準備，就只好規行矩步，那邊廂，文化人隨意輕率，就判定這是文化的斷裂。現代社會，動輒就強調鴻溝，撕裂、傾斜，人類文明本來是由內而外延的圓，在團團散開的過程中，對野蠻和無知，可以包容、可以遷移轉化，現代社會訊息縱橫，流通無阻，卻偏偏要集中筆墨和目光強調隔閡，誇張放大了時代更迭中變化和相異，原是自然不過的現象。

無論我們願意不願意，今天的所謂語文能力，定義和上一代已經不同。有時我們的社會，膚淺地以為只要懂得字詞正音，或者知道一些只存在於古書的句子意思，就是學習中國語文的崇高境界。電視台節目從來都強化這種誤解，卻不知語文能力貴在溝通，也就是接收

和表現，聽說讀寫，面面俱存。搬弄一些艱深的字詞讀音、解說出處險僻的成語，就認為是上乘語文，其實相當單薄浮淺；一如中學生考公開試時，以為加入幾個深字和成語，就會取得高分。從另一面看，這種對語文的驚恐症，和潮語的濫用「超」、「勁」、「喪」、「爆」等抽象從簡的表達，一樣空洞和霸道；而且夾着幾分強人無稽的可惡。

潮語的專制，未必是最令人擔憂的地方，令人擔憂的是當中滲透出單薄和重複的表達模式，人類文明賴以輝煌的優雅和深邃，都成為擱置一旁的敝帚。不過只要是敝帚，不管是自家，還是別人家中的，都不賣錢。潮流潮流，無論是潮是流，都暗含不穩定的意思；隨時流逝。今朝盛開，晚來就已經可能凋謝。像今天大家滿口科技民主，誰還會說在五十四年間風行一時的「德先生」、「賽先生」。本來，既然以「潮」字來形容，就應該有漲退的定律。「一時火，一時風，一朝退天下難容」，說年青人心中完全迷惘，又未必全是事實。

潮語不可怕，也不可惡，我們對語言文字，從來只要求準確和表現力，如果我們真的相信「O嘴」很能表現驚訝；「屈機」也真個道盡某一種強勢，「超低能，

勁白癡」就是罵人的極致，這些潮語就會恆存，甚至成為某種密碼，像社工在網上尋找待輔導的邊青，也要用上潮語溝通。只是我們更應在意語言傳達背後的可能和暗示。

以愛情為例，我的孩童年代，女孩子是要「追」的，那是一種企盼仰慕的表達和具體，所以叫人想起：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這種「疑是玉人來」的浪漫，閃動着青春的情愛。到我成長；出現了「溝」字，同學朋友喜歡如此稱自己的愛情行為，那變成一條橫線，沒有高低上下之分，佳人敗壞顧望的姿勢隱褪了；到我漸入壯年，又出現了「荆」字，看學生和電影對白都用得心安理得，我卻很不是味意，因為當中明是挾幾分傷害之意。動詞轉變，由《詩經》而來的那份上下朔迴、宛在水中央的浪漫沒有了，只餘下時代潮流的涼薄和不安！我以前常跟班上的女學生說，不要讓男朋友稱呼自己為「菜」，因為那是鋪陳在餐桌盤碟上、讓人隨意夾去的食物。如果你希望男朋友尊重你、珍惜你，就要尊重自己，推而及之，用來表達「菜」的暱稱——一條，也不可。我從不因此感到自己老套，我的學生也從不因此以我為老套，因為區區語詞，透露了

人心的憐愛相惜，沒有「潮」與「不潮」的考慮。

潮語之為物，從來都有，只是現今世界網路盛行，人們忽然大幅增加使用語言文字來溝通，於是為方便、為傳神、為隱藏，多所發明而已。我不鼓勵提倡，也不以為怪，必要殲之而後快。我教導學生，仍然要說語言重視準確和表現力。潮語之好壞，也只需從這些方面判斷，不需沾沾自喜，敝帚自珍；也不用怒目金剛，睚眦欲裂。好的語言助人溝通交感，潮語單薄貧乏，承擔不起這種任務，自然只流轉滾動在某一範疇情境。背後的真正困局，是現代人的崇尚濫俗，追求淺薄。我們要重視的，是把優雅與俚俗、深刻與浮泛分得清楚，也教導下一代去分辨。藝術文化和人際間溝通，恆守住真正的動人。潮語像通俗小說，只耐得住剎那的煽情，讀者很容易忘記。如果真有能耐流傳下去，終有一天，它自然會在語言文化的空間中，守着自己的位置。

現實人生禍福無端，聚散難期，所以千多年來，總叫人容易想起「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青少年今日不感到，漸入人生悲歡離合，自有感悟之時，我們不必太擔心。我們想像一對好朋友，互訴心事、互述平生志向，潮語會是對話的主要元素嗎？人生甘苦交加，

我們自有「別來滄海事，語罷暮天鐘」的重逢，也會有「今宵好向郎邊去」的柔情蜜意。人與人之間，如果有高層次和深情真摯的溝通交流，單薄的潮語當然不足應付，那時或者老套的詩句如「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仍然是大家共有的嘆喟。如果真要擔憂，我只會擔憂這年代的年青人，還重視深情真摯的溝通交流，還真會有高層次的心靈追求嗎？

潘步釗《美哉少年》（香港：匯智出版社，2010年）

潘步釗，〈考試的傳說〉

《美哉少年》（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2010）。

1. 這篇文章以「考試的傳說」為題，作者希望以此在文中說明什麼問題？
2. 作者將全篇分成三個部分，分別提到個人的考試經驗、古人的考試情況和今日香港的考試制度，這種內容上的組織安排，對文章主旨的表達有什麼作用？
3. 為甚麼作者說考試是「必須的罪惡」？你同意這說法嗎？
4. 作者提出對於公開試，要有一種「若即若離的相處，它才成為推動你人生的正面動力」，你同意這種觀點嗎？
5. 作者在文章結束時提出，科名「終有一天，成為你生命中遙遠的傳說」，所要說明的是什麼道理？

潘步釗 考試的傳說

傳說我人生的第一次考試，是交空卷的。

為甚麼是傳說？因為那是媽媽在我長大後告訴我的，完全是口述歷史，難免有很大的存疑成分。故事的文本很簡單：學前時代，家裏很貧窮，所以媽媽沒有送我進幼稚園，只是把我留在家裏，親自教我認字。要鄭重申明：那是貧窮，不是對教育制度的不滿！到了升讀小學的時候，要考入學試。媽媽說：那時主考老師給你試卷，時間完了你就把卷交回給他，上面甚麼也沒有答。原來因為沒有上幼稚園，所以紙筆考試，對於我的人生從未有過的經驗，根本不知道要做甚麼。你的老師很好，於是改為口試，逐道試題用說話來問你，結果你每條都懂得答案，就被取錄了。媽媽在很多年後，仍然由衷地感謝我這位小學老師。

我向來在公開試成績中等，驚濤駭浪，再萬轉千

迴，才取得學位。朋友取笑我說，原來你不擅長考試，是童年陰影。我聳聳肩，反正這些都是母親說的故事，於我疑幻疑真，不過我記得這老師姓甄，二年級時，曾看穿我每次交給她的勞作家課，都是由二哥代勞，便下令我在上美勞課的日子留堂，坐在教員室她的教師桌旁完成。於是每逢星期三，媽媽在學校門口等我，同學都回家了，我做好勞作功課，落寞孤獨地走出校門，隨着媽媽回家。那時候，我覺得老師未免太認真，也不認為懂得做這些勞作手工，對人生有甚麼重要。或者與此同時，某些奇妙的觀念，也在暗暗滋長，例如「一人做事一人當」，連累了媽媽，我確是到現在仍然有點歉愧。

這樣的日子已經飄得很遠，七十年代初，那應該是人人自危、人人色變的政治歲月。爸媽哥哥都生活在艱難貧困的日子中，我一個懵懂孩童的瑣事，如何嵌入舉家生計的厚厚回憶中。不過，我還是很感謝甄老師；雖然除了男性化的外形，略帶沙啞的聲線，我已經不再留下對她的任何印象。說到底，她為我進行了人生第一場學術評考，而且取得成功，予我數十年來，在考場並非常有的公道評價。最重要的是她取錄了我，開展

了我的小學生涯。

二

考試在古代叫科舉，是中國的重大發明。梁實秋在〈談考試〉文中說過一段很有意思的話：

英國的卡賴爾在他的《英雄與英雄崇拜》裏曾特別指出，中國的考試制度，作為選拔人才的方法，實在太高明了。所謂政治學，其要義之一即是如何把優秀的分子選拔出來放在社會的上層。中國的考試方法，由他看來，是最聰明的方法。照例，外國人說我們的好話，聽來特別順耳，不妨引來自我陶醉一下。平心而論，考試就和選舉一樣，屬於「必須的罪惡」一類，在想不出更好的辦法之前，考試還是不可廢的。

真的，我們討厭考試，害怕考試，也無法不經歷考試。「必須的罪惡」，一針見血說出其中優劣互依的真實。考試就如踢足球要射十二碼分勝負的制度，你說它不公平、靠運氣、折磨球員，再多的批評，可是數十年來，我們就是想不到取代它的方法。這種說它不好，

卻沒有比它更好的事物制度，在人類社會觸目皆是：法律、婚姻、甚至民主制度也如是。我們社會今天要篩選人才，社會階層轉移流動等，除了考試，似乎沒有更公平的方法。

不過考試在今天，有一種學術性味道濃重一些的稱謂，叫評估。嚴格地說，這種說法概念比考試寬廣，講究多元和對學習的回饋，也更富有時代意義。至少這是相對於舊社會的說法，減少了決勝千里的人生成敗色彩。的確，我們總不會聽到有古代書生帶着行囊，在渡頭的楊柳樹旁，跟妻子離別時說：我上京接受評估，你要等我。相對於考試或科舉，評估的某種意義，正也在說得客觀模糊，失去從來的對錯分明、成敗立判。

古人說「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有了科舉，社會階層才有了升降機，現代人說隔代貧窮最可怕，科舉就是一帖解救的良方。文章憎命，對於與考試無緣的人，科舉就變得像沒有窗戶門口的房子，進不去就是進不去。這樣的故事從來都有，不分古今，《儒林外史》的「范進中舉」，大家耳熟能詳；另一本古典小說，蒲松齡的《聊齋志異》，其中有〈葉生〉故事，寫葉生懷才不

遇，科舉落第，竟致死後離魂，可見其積憤憂鬱。蒲松齡平生也是為科舉所歎，早歲在縣、府、道諸試中，均考取首名，中秀才，可是後來在鄉試卻一直不第，以教書和出任幕僚過活。如此不得意的人生，蒲松齡當然要借文章抒洩一下，先是葉生自云：「是殆有命，借福澤為文章吐氣，使天下人知半生淪落，非戰之罪也，願亦足矣。」再以異史氏身份慨嘆：「一落孫山之外，則文章之處處皆疵。」蒲松齡在書中寫了很多書生的故事，不過葉生的淒涼黯淡，最是作者曲傳之音。古人為科場所歎，傷心薄命，也實在叫人慨嘆。

三

這年頭考試制度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因為雄踞香港教育路上，當道不豫的仍然是揶揄「求學不是求分數」的態度，人人理直氣壯，稍持異見的，就被視作偽善或犬儒腐見。設計課程，推動教育，都必須照顧這種考試的「倒流效應」。唐代詩賦取士，結果唐詩大倡；北宋歐陽修主持科舉，唐宋古文運動遂得以完成；明清八股文是考場求售的必須文體，於是大盛於明清兩代。數年前，為了推動中學生的文學創作，課程策劃者將文

學創作結合校本評核，要求學生嘗試寫詩作小說，又與公開試分數掛鉤，產生的仍是相同的作用。

無論你堅守「求學不是不分數」，還是你認為「分數等於一切」，我都建議大家彼此尊重。教學理論上言，考試有很多功能，的確是「必須的罪惡」，也是公平的使者，明刀明槍，最公平不過。考試只是人生的一部分，和婚姻家庭、事業、嗜好消遣，甚至交朋結友一樣，每一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態度和選擇，最重要是「願賭服輸」，像葉生如此著緊科名，就要有因此積憤而亡的準備；你若選擇笑傲考場，則更需具備處處碰壁的氣魄胸襟。我平生不擅考試，特別是公開試，多年來，苦頭和白眼都嘗過不少，卻從未因此懷疑過自己的才智聰明。不要說道德風義，即使才華學問，原就昭昭展示在氣度言談、舉手投足之間。一夜青燈，半生黃卷，學問和學歷當然都自在心中。康熙十九年（1680），四十歲的蒲松齡寫成《聊齋志異》，我們今天仍然津津樂道，一再為作者投注其中的心思才力而傾倒，可是誰會記住——這一年，誰當了新科狀元。

對於公開試，要有一種若即若離的相處，它才成為推動你人生的正面動力。視若輕塵，當然影響了前途；

過分執着，困人亦自困。科名不比金錢，不要以為將它牢牢死抱在懷中，就是真正的擁有，卻不知它早已從你交纏的雙臂中溜走，而且愈行愈遠，終有一天，成為你生命中遙遠的傳說。

沈祖堯，〈向錢看的教育〉

沈祖堯、潘誦軒合著，《筆遇》（香港：經濟日報出版社，2016）。

1. 年青人為買蘋果手機而不惜賣腎換錢，背後反映了怎樣的社會問題？甚麼原因促使社會出現這些問題？
2. 甚麼是作者認為「不負此生」的生活？你是否同意？為甚麼？
3. 香港學生在報考大學時的選科考慮有哪些因素？你自己呢？試分享你的體會。
4. 作者在文末引述《大學》篇中孔子的話希望說明甚麼道理？這些說話在現今社會的意義何在？試談談你的看法。

沈祖堯、潘誦軒合著，《筆遇》（香港：經濟日報出版社，2016）。

誦軒：

這是一個崇尚物質主義的時代。前一陣子，我在面書看到一則內地新聞，把我嚇呆了。話說一個十來歲的中學生，為了買一部最新型號的蘋果手機，把自己的腎臟賣掉。出賣器官的價錢是兩萬人民幣，但經過幾個中介者七除八扣，只剩下六千元，還好可以買一部手機加一部iPad，非常荒唐。我想，學校的教育徹底失敗了。不然，怎會有這樣的年青人！

今天的高等教育，以畢業生的工資來評估教育成效。因此，報章會把每所大學畢業生頭一年的平均收入作比較。此外，今天的大學最關注排名，特別是金融及市場管理課程（EFMD和EQUIS），且愛比較這些課程的畢業生薪酬上升幅度。一位在國內頂尖大學任教多年的老師，退休後在一次演講中說：「我記得幾年前，母校開什麼紀念會，有一個人說部長以上有多少是出自我校的。我相信除此之外，高科技的企業家、富豪榜上的也一定有很多出自本校。如果一所學校，不管多高智商的學生，他的注意力和引導的方向都是往這個方向走，我覺得就屬於精神上的摧毀。今天社會面對的危險不在於揭竿而起的動亂，而在於道德與價值觀的潰爛。全民族精神的墮落是很可

悲，一代人的失落很可怕。」

記得我當校長的第二年，大學決定把原本三小時長的畢業典禮一分為二，因此要求我在典禮上給畢業生說幾句勉勵的話。於是，我便隨意寫了一段兩分鐘的講辭，題目是「不負此生」，用意是勸導同學不要盲目崇拜金錢、物質和權力。當中有這樣的一段：

今天早上我翻閱了畢業禮的典禮流程。當我見到畢業生名冊上你們的名字，我按手其上，低頭為你們每一位禱告。

我祈求你們離校後，都能過著「不負此生」的生活。你們或會問：「怎樣才算是『不負此生』的生活呢？」

首先，我希望你們能儉樸地生活。在過去的三至五年間，大家完成了大學各項課程，以真才實學和專業知識好好裝備了自己。我肯定大家都能學以致用，前程錦繡。但容我提醒各位一句：快樂與金錢和物質的豐盛並無必然關係。一個溫馨的家、簡單的衣著、健康的飲食，就是樂之所在。漫無止境

地追求奢華，遠不如儉樸生活那樣能帶給你幸福和快樂。

其次，我希望你們能過高尚的生活。我們的社會有很多陰暗面：不公、剝削、詐騙等等。我籲請大家為了母校的聲譽，務必要莊敬自強，公平待人，不可欺侮弱勢的人，也不可以做損及他人或自己的事。高尚的生活是對一己的良知無悔，維護公義，事事都以道德為依歸。這樣高尚地過活，你們必有所得。

其三，是我希望你們能過謙卑的生活。我們要有服務他人的謙卑心懷，時刻不忘為社會、國家，以至全人類出力。一個謙卑的人並不固執己見，而是會虛懷若谷地聆聽他人的言論。偉大的人物也不會整天仰望山巔，他亦會蹲下來為他的弟兄濯足。

假如你擁有高尚的情操，過著儉樸的生活，並且存謙卑的心，那麼你的生活必會非常充實。你會是個愛家庭、重朋友，而且關心自己健康的人。你不會著意於社會能給你什麼，但會十分重視你能為社會付出什麼。

當時我說這番話，只覺得是老生常談，沒有想過這麼簡單的訊息，竟然被轉載在香港的多份報章，繼而在內地的社交網站上廣泛流傳。聽說網上點擊率逾一百萬次。四年後的今天，我在國內大學校長的交流會上，仍會不時討論這段畢業典禮講辭。大家都認同一個事實，今天的教育，太強調經濟和影響力的效益。

社會似乎已接受了教育制度價值觀之轉變，實在令人惋惜。學生報考大學或主修範疇時，不是基於興趣，而是考慮該課程的出路和專業地位。家長為子女選校選科時，不是基於教育素質和思維培育，而是大學的名氣和學科的就業導向，以致歷史、哲學等人文學科，甚至物理、化學等都成為冷門學科。僱主招聘大學畢業生時，不是基於他們的才幹和品德，而是他們所讀的大學。因此，排名最前的學府，如哈佛大學和史丹福大學的學費，怎樣提高也不成問題，而該校畢業生的身價亦不斷提高。再者，有時候，社會人士對大學提供的贊助和捐獻，不一定基於他們對提升教育素質的認同，而是大學排名採用的表面化研究指標和經濟效益。在這樣的氛圍下，學生畢業後所追求的，就側重於個人在金錢和地位上的回報。

我們常常慨嘆教育制度因市場價值而扭曲，可是我們（學生、家長、老師和僱主）卻要為這個問題負責。要改變這個現象，整個社會、家長和政府的價值取向都要有所改變。試想我們的金融和風險管理專才，著重個人入息而非社會整體經濟的穩定發展；我們的醫護人員，關心的是超時補貼和生活素質而非病人健康和專業精神；我們的法律專業，強調的是他們代表的客戶能負擔多少訴訟費而非事實與公義，那我們的社會會變成怎樣？向錢看的教育，會把我們的社會推到一個因利忘義、弱肉強食的文明沙漠裡。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這段出自孔子的話，林語堂譯得太好了。他說：「高等教育的目標在於保存人高尚的品格，在賦予人民新的生命，在止於完美之境。知道止於完美的境界之後，對人生才有固定的宗旨。對人生有了固定的宗旨，才能得到心境的寧靜。得到心境的寧靜之後，才能安然自處。能安然自處，才能用心思考。能思考，才能有所知。而每件事務之演變上也是有其開始，有其終結的。因此了解事物之正常關聯的順序，乃是智慧之始。」沒有道德和價值觀的教育，算不上是教育。

林沛理，〈易趣與難趣之別〉

林沛理：《英為中用十大原則》（香港：香港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2017）。

1. 你對作者提到的“易趣”和“難趣”有何領會？在你的世界中，甚麼是“易趣”？甚麼是“難趣”？
3. 作者說：“為得到最深刻的愉悅和滿足，有時不得不放棄很多微小、短暫和膚淺的樂趣。”你有沒有這方面的經歷？可以和同學分享嗎？
3. 你快樂嗎？你認同快樂可以分為不同的層次嗎？即有所謂“高等快樂”和“劇烈的快樂”之分嗎？

何謂易趣？只要你口袋裏有幾千元或一張信用卡，頂多加一點耐性，遲早必能擁有最新型號的iPhone或Samsung Galaxy流動電話。超級市場和百貨公司的貨品應有盡有，你不用花吹灰之力，就可以把你願意花錢購買的東西據為己有。還有為你提供視聽之娛的大眾娛樂工業、滿足你口腹之慾的大小食肆，以及讓你隨時隨地與世界「親密接觸」的互聯網和社交網站，皆確保各式各樣「易趣」的供應源源不絕。

林沛理：《英為中用十大原則》
(香港：香港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2017)。

問題是「易趣」得太易，它們在為城市人提供「即時滿足」(instant gratification)的同時，也扼殺了他們內心深處最熾烈的慾望與享受樂趣的能力，即英國社會學家穆勒(John Stuart Mill)口中的“CAPACITY FOR PLEASURE”。

Capacity一詞之用途廣泛，遠非同義的ability能及。只要在它之後加for，馬上變成能力的多用途軍刀(Swiss army knife)。例如capacity for hard work(刻苦耐勞的能力)、capacity for pleasure(享受生活樂趣的能力)和capacity for boredom(忍受沉悶的能力)。

易趣與難趣之別

唾手可得「易趣」充斥社會，為香港人提供即時滿足，但也扼殺了他們享受樂趣的能力……

朋友在網上成功訂購最新的iPhone，急不及待發短訊向全世界報喜，其志得意滿的樣子，就像一個喜獲麟兒的父親。現代人從消費之中獲取快感與滿足，我們置身的社會，充斥着這類唾手可得的「易趣」(easy pleasure)。

當整個社會泛濫消費信息，當人的物慾和佔有慾不斷被刺激，他的慾望必然會被攤薄和稀釋。結果，我們不再懂得「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只學會「人到情多情轉薄」。我們不會死去活來地渴求得到一樣東西，只會漫不經心地希望得到一百樣東西。

不會牽腸掛肚地渴望得到任何東西的現代人，永遠無法領略千辛萬苦之後，慾望得到真正滿足一刻所感受到的「難趣」(difficult pleasure)。史

上其中一個最偉大的登山運動員馬洛里 (George Mallory) 窮一生精力要征服天下第一峰珠穆朗瑪峰，最後死在登峰的途中，年僅三十八歲。有記者問他為何要費那麼大的力氣、冒那麼大的危險去登峰，他答道：「因為它就在這裏。」~~THE ANSWER WAS THERE.~~

誰說句子不宜以Because開始。很多意味深長、充滿智慧的答案都begin with because。例如Because it's there, 'Because I can'和Because it happens. 美國詩人Emily Dickinson最廣為人知的作品就是Because I Could Not Stop for Death。

這就是「難趣」的真諦——難趣之趣在於難。為得到最深刻的愉悅和滿足，有時不得不放棄很多微小、短暫和膚淺的樂趣。對很多人來說，跑馬拉松是自討苦吃，但挑戰自己體能極限的那份滿足感，又豈是老泡在電視機前的couch potato所能想像？香港人最需要的，可能就是一種由強烈慾望驅動的激進享樂主義，以取代一味鼓勵人花錢的消費主義。

你也許會說，樂趣就是樂趣，快感就是快感，何苦要將它們論資排輩，分階層和等級？這與我們享受樂趣、體驗快感又有甚麼關係？穆勒認為，人類感受得到的樂趣和快感，有一時的愉悅；亦有長遠的快樂；有感官的刺激，亦有心靈的慰藉。令人驚訝的，是人為了追求幸福和意義，有時不惜捨易取難，甚至以身犯險。他會放棄衣食無憂的生活，而獻身於朝不保夕的革命事業；也不會為一刻的銷魂而背叛堅真的愛情。換言之，他願意為屬於更高層次的所謂「高等快樂」~~higher pleasures~~而放棄「劇烈的快樂」(intense pleasure)。穆勒要全人類思考的問題是：你甘於做一隻

為intense pleasure而亡的老鼠，還是一個為higher pleasure而活的人？

Higher可指某些重要但難以言明的東西，例如my mind was on higher things (當時我想着更重要的事。)；或者I believe in a higher authority. (我相信有更高的權力冥冥中主宰世界。)

我相信香港人當中，為飲食購物此等easy pleasure而活的不在少數。不要奢談甚麼高等快樂，就連劇烈的快樂，對這些(自以為是)精明消費者來說也頗陌生。他們的幸福觀，或者比較接近另一個英國大儒——哲學家和社会改革家邊沁 (Jeremy Bentham) ——提出的「最大幸福原則」(the greatest happiness principle)。

邊沁認為，最合乎道德的行為，就是令人覺得最快樂、欣慰和滿足的行為。所以不用大費唇舌，談甚麼生活的藝術和哲學。所謂美好生活，就是賺最多的金錢，使我們在飲食男女各方面得到最大的滿足。這套享樂至上的功利主義幸福觀無視人類更高層次的需要，被後世批評為「豬羅倫理學」(ethics of swine)。

環顧今日的香港，殺氣騰騰、理直氣壯的功利主義壓倒一切。甚麼東西的價值我們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只是全無價值的概念而已。所以我們會毫不猶豫為一層豪宅而放棄一個家，會千方百計逼子女學琴卻從未想過培養他們對音樂的興趣。困難的樂趣太難，高等的快樂太高，好逸惡勞的香港人，當然敬而遠之。

吳志軒〈尋找可持續的幸福〉

「佛門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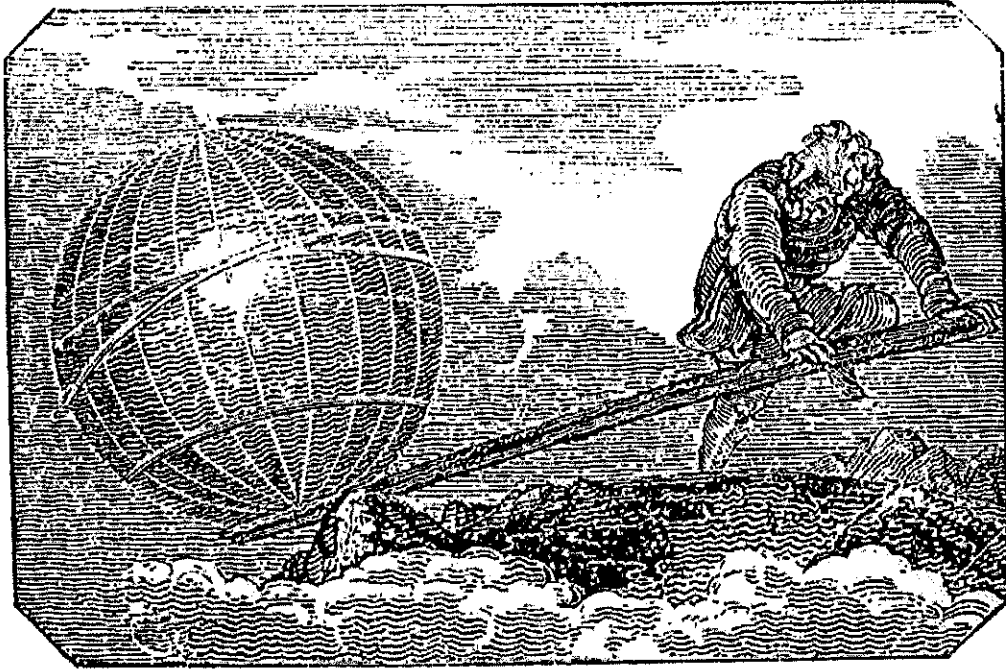
<https://www.buddhistdoor.org/tc/mingkok/%E5%B9%B8%E7%A6%8F%E6%A7%93%E6%A1%BF%E9%A1%98%E4%BD%A0%E5%B9%B8%E7%A6%8F%E5%86%8D%E5%B0%87%E5%B9%B8%E7%A6%8F%E5%82%B3%E7%B5%A6%E5%88%A5%E4%BA%BA>

2018. 7. 5

1. 你認為怎樣才是幸福的生活？幸福的來源是甚麼？
2. 你對未來有甚麼期望？

尋找可持續的幸福

作者：吳志軒



圖片：阿基米德曾說：「只要給我一個支點，一 根足夠長的槓桿，我也可以推動地球。」

《幸福「槓桿」》是筆者新書的書名，帶出的主題是如果懂得令自己幸福的方法，通過智慧和慈悲可以將幸福不斷放大槓桿，與人分享。在過程中，不但自己的幸福不會減少，反而是別人愈幸福、自己愈幸福。

幸福定義不斷演變

但是要將幸福「槓桿」與人分享，首先要明白幸福的源頭和創造幸福的方法：尋找幸福是要通過物質生活的工作和消費，還是要通過精神生活的價值和意義？

西方社會對幸福快樂的定義隨着時代不斷演變：亞里士多德（Aristotle）主張美好的人生（Good life）是以道德去衡量，霍布斯（Thomas Hobbes）則將好壞以享受到快樂和痛苦來定義。快樂後來由享樂改為功能上的用途定義，起初如邊沁（Jeremy Bentham）強調社會的功用（utility）和福祉，後來演變如穆勒（John Stuart Mill）強調個人的功用和滿足。西方經濟學最終將生產和消費、功用與個人及社會的幸福快樂連結在一起。

升職加薪未必幸福？

就幸福快樂而言，我們對真正的幸福感（我們真實的感受）、別人是否覺得我們幸福（別人的眼光）、是否擁有幸福的途徑（金錢、工作、家庭、物質生活等等）三者之間的關係，不容易分辨。我們的工作和財富久而久之成為我們的身位定位，甚至當失去了這些東西時，我們覺得失去自我肯定和別人的認同。最壞的情況是當不幸破產或失業時，連自我尊嚴和精神的支柱亦被同時摧毀。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卡納曼（Daniel Kahneman）和他的研究團隊認為，大家或許過分強調傳統的成就（如收入）對快樂的貢獻。美國經濟學家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的著名悖論 Easterlin Paradox 指出，雖然在個人層面上收入提升有助個人的福祉；但在國家層面，以實質收入或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計算的經濟增長，與報告的福祉水平（reported well-being）並非有很大的關連。另外，若果相對收入（relative income）保持穩定而絕對收入（absolute income）水平提高，個人的福祉或許不會改變。研究證明收入提高可以增加快樂的機會和渠道，但長遠對人的福祉的影響反而不大。大家可能會問，經濟理論不是強調收入、功用和快樂的關係嗎？如果日做夜做升職加薪，經濟發展都不能讓人感到更幸福，那發展所為何事呢？

再思苦樂 重塑生活

經濟學原有「經國濟民」的意思，是家國大事，影響深遠。然而現在新古典主義經濟（neoclassical economics）強調個人主義，假設個人是理性、自主、自利甚至是自私的個體，追求利益最大化，重價格多於價值。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主張自由市場經濟，在法律和市場規範內反對政府干預。反觀佛法強調人的行為思想，佛經常言放下、要捨得；市場經濟的最大化和佛法的最小化，似乎牛頭不搭馬嘴。佛法希望我們明白「苦」和「樂」的真正分別，不要以「苦」為「樂」，快樂亦有不同的層次、不同的穩定性和可靠性。我們會否願意放棄低一層的快樂而去尋求更高層次的快樂？

提到更高層次的快樂，有不少朋友會問佛教不是強調放下嗎？不是要不執着、要解脫嗎？要離「苦」得「樂」不是很矛盾嗎？其實如果將「樂」的定義以「離苦」、「寂靜」和「煩惱的熄滅」去了解，那在生活中將「苦」層層遞減，又有何不可？

佛學為經濟學注入新思維

佛學經濟學是筆者過去 8 年專注研究的領域。這一類跨領域的研究不論對傳統經濟學或佛學研究來說都是另類的。但正如 David Loy 在 *The Religion of the Market* 一文所警示，市場經濟已發展成一宗教，要世人相信消費為核心價值、

經濟法則為教條、無形的市場之手為全知全能的救世主。現今物質文明的發展已去到一個樽頸位，而經濟市場過界演化成宗教，卻又未能以有限的資源去滿足人類的無盡需求。或許佛學經濟學這一類跨領域的研究，可以用不同角度對市場經濟遇到的問題提供新的思維角度和解決方法。

感恩得到灼見名家邀請，筆者重新整理了近年在佛門網的專欄文章，將和大家一起探索如何在經濟生活中體會佛法的智慧、如何將幸福持續「槓桿」，為自己、為他人創造幸福。

【作者 吳志軒】

東蓮覺苑行政總監。曾任瑞瑩資本首席投資總監、摩根士丹利自營投資部門副總裁，在亞太資本市場擁有超過 15 年的經驗。Ernest 以 Phi Beta Kappa 畢業於芝加哥大學，獲經濟學學士和國際關係學碩士學位。2007 年於香港大學獲佛學碩士，2016 年獲哲學博士，研究佛學經濟學的題目為可持續經濟發展的投資模式。現於港大佛學研究中心擔任客席助理教授，為本科生教授佛學與經濟學課程。

文章轉引自「佛門網」

<https://www.buddhistdoor.org/tc/mingkok/%E5%B9%B8%E7%A6%8F%E6%A7%93%E6%A1%BF%E9%A1%98%E4%BD%A0%E5%B9%B8%E7%A6%8F%E5%86%8D%E5%B0%87%E5%B9%B8%E7%A6%8F%E5%82%B3%E7%B5%A6%E5%88%A5%E4%BA%BA>

2018.7.5

梁振威〈兩磅曲奇餅：一個生涯規劃教育的故事〉

兩磅曲奇餅：一個生涯規劃教育的故事 | 梁振威 (master-

insight.com) 《灼見名家》2022年2月6日

1. 文中的父母「不投資兒子升讀大學」，卻協助兒子從事烘焙的工作。假設兒子成績優異，有條件進入任何一所大學、修讀任何一個學科，你認為父母應否繼續支持兒子「選擇不升讀大學而做烘焙的工作」？
2. 作者說：「若能在自己的生涯規劃中，以服務國家作為規劃，這是高尚的生涯規劃。」你是否認同作者的觀點？試略抒己見。
3. 文中的父親說：「我的推行生涯規劃教育的理念是『實用感』和『幸福感』。」你認為怎樣的生涯規劃才能達到「實用感」和「幸福感」？

梁振威〈兩磅曲奇餅：一個生涯規劃教育的故事〉

一個雨後的黃昏，我在家居附近的小街閒逛。雨後的小街，顯得清新寧靜，在幽靜的街角，我赫然發現一間新張的餅店。餅店不大，賣的是烘焙餅食。這小店，看來是在這天才開張的，但店前並沒有擺着滿「新張誌慶」、「生意興隆」、「客似雲來」的花籃，只有一個寫着「恆心有恆業，隆德享隆名」的花籃，冷清清的站在店前，花籃的署名是「爸媽」。說這是一個祝賀新店開張的花籃，倒不如說這是送花籃的人對店主經營的訓勉。

巧遇故人 心有疑惑

也就是這個獨特而唯一的花籃，驅使我走進這小店。迎接我的是一個穿着圍裙，20出頭的小伙子：「您好，想買什麼？」「曲奇餅。」我隨意的回應。聽到我說要買曲奇餅，他眼神一亮，然後不斷的介紹餅櫃內的特色曲奇餅：巧古力曲奇、香橙曲奇、桂花曲奇、蓮子曲奇……他那熱情而帶着幸福感的介紹，讓我對他的興趣多於那些特別的曲奇餅。當我還在驚異於這個小伙子那自豪和喜悅時，背後傳來一聲「梁 sir」，我轉身一看，一位「知天命」的男士笑着的走過來，我依稀記得在多次生涯教規劃教育的分享會上，聽過他的分享。

據知他夫妻倆都是中學資深的升學及就業輔導主任（Career Master）。寒暄一翻後，他告訴我那穿着圍裙的小伙子是他的兒子，中學畢業後，為實踐他在中學時的生涯規劃，選擇不升讀大學而做烘焙的工作，這是他為實踐兒子在中學時所定下的生涯規劃而投資的小店。我望着他父子倆，滿腦狐疑，幹嗎這負責學生生涯規劃教育的升學及就業輔導主任不投資兒子升讀大學，卻協助兒子實踐他特別的生涯規劃？這不是一般家長或老師對孩子所期望的生涯吧。話題也由此回到他的專業——生涯規劃教育來。

話匣子一打開，他就侃侃而談。

讓孩子感受家人支持

他說：「生涯規劃早見於先秦時期。『凡學，官先事，士先志。』（《禮記·學記》），『官』、『士』，這是古時學生在塾、庠、序、學，當時的學校讀書時的立志，並以此作出學習規劃，以達到由『子成』到『大成』。學做官也好，學做士也好，得按『學習規劃』進行階段性的學習。規劃的最終的目的，在解決生活之餘，也必須用於國家。這是古代生涯規劃教育基本價值觀。現在的情況不一樣了，但若能在自己的生涯規劃中，以服務國家作為規劃，這是高尚的生涯規劃。」

談及推行生涯規劃教育的理念時，他望着他的孩子，笑着說：「我的推行生涯規劃教育的理念是『實用感』和『幸福感』。當了 Career Master 多年，我每年在同學入讀中一時，便為他們設立一個『生涯規劃檔案』。檔案最重要的資料，是同學由中一至中五每年在學期開始時對自己將來的職業及生活的一篇作文。這個檔案，會在學校家長日給家長閱覽，讓家長從孩子的作文，了解孩子的生涯規劃。在接見家長時，鼓勵他們多欣賞孩子的生涯規劃，並在所及的能力範圍，給孩子切實的輔助，讓孩子感受到家人支持的幸福。」

讓同學深度認識自己

「每年試後，我會安排生涯活動日。活動的內容，是根據同學的檔案，針對同學的需要，配合課程指引，以『知己』、『知彼』和『規劃力』作為活動主題，分時段進行，同學可自由按自己所需，參加不同的活動。但在活動前，同學必先於課堂內完成閱讀自己的檔案，並因應檔案內的自己的文章內容，對自己的將來、夢想、生活及職業，作出修訂及規劃。」

「這個檔案存在校內，直至中五上學期完結後，才發回給同學。這時，同學經多年的學習，對自己已有深度的認識，也開始思考自己中學畢業後的生涯，這檔案在他們進行生涯規劃時，或多或少會給他們有實用的感覺。」說着，他稍稍一停，望着他的孩子，說：「他就是從中五開始，規劃他以『烘焙』定為他的生涯規劃。」

經營人生 幸福與實用更重要

時候不早了，我隨便的買了兩磅蓮子曲奇。踏出小店，我拿着手上的曲奇餅，回望那年青小伙子那幸福的表情，想起了他在給我包裝那兩磅蓮子曲奇餅時的自豪，我忽醒悟，我們實在忽略建構中學生對學習的幸福感與實用感。生涯規劃，是為自己在求學、求職，甚至養兒育女的道路上設定藍圖，這是經營人生。對於人生的經營，我們在推行生涯規劃教育時，建構同學的幸福感與實用感至為重要。

歸家途中，回想店前的花籃。花籃上的 10 個大字：「恆心有恆業，隆德享隆名」，不正正是中學以至大學生涯規劃教育的標竿嗎？

兩磅曲奇餅：一個生涯規劃教育的故事 | 梁振威 (master-insight.com) 《灼見名家》，2022 年 2 月 6 日